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顾问 任继愈 庞朴
主编 王中江

曾春海 著

嵇康的精神世界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顾问 任继愈 庞朴 主编 王中江

嵇康的精神世界

曾春海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嵇康的精神世界/曾春海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 5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ISBN 978 - 7 - 5348 - 3162 - 1

I. 嵇… II. 曾… III. ①嵇康(224 ~ 263)——生平事迹
②嵇康(224 ~ 263)——思想评论 IV. B23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5850 号

Ji Kang de Jingshen Shijie

嵇康的精神世界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新星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640mm × 960mm 1/16 印张:14. 5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 - 4000 册

版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 序

当回首 20 世纪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摸索和研究历程并前瞻和期望一种新的可能之际，中国哲学的一些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改变现状和获得新的契机的途径。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和学术，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问和学术一部分的中国哲学是什么呢？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来概括它的类型。一定的迹象显示了观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式的多样性，不过要说到在这种多样性中究竟有何种“典型”范式和原创性恐怕就令人踌躇和惶恐了。人们不时地都在抱怨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并相信发现了导致问题的根源，但深思熟虑地检讨和反省则非常罕见，在惊人的说法中却是惊人的轻率和漫不经心。

在此姑且拿“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正当性问题来说。相应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对运用西方范式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生搬硬套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在人们开始对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观察中国哲学这种常见方式产生怀疑的时候，有人甚至对通用已久的作为代表“中

国学问”一个方面的“中国哲学”这一术语本身也发生了动摇。理由好像是说，“哲学”这一概念是“西方的”，它生长于西方并适合于西方，它所承负的那一大套东西都是与西方文化整体联系在一起的，让它成为代表中国一部分学问的化身，就使中国学问丧失掉了它的真实面目和独特性。在这种忧虑之下，拒绝西方观念和范式在中国运用的主张和放弃“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这样的说法如何呢？按照这种逻辑，撇开自然和技术领域，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几乎所有领域所使用的近代翻译过来的大量源于西方的“术语”（许多是通过日本）都得放弃，用这些术语所命名的学科和学术分类都得改弦易辙。

且不说这样做的可能性如何，关键是这样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意义。张之洞很早就拒绝使用“哲学”这一术语，因为他把“哲学”只看成是“西方之学”，因此试图以“名学”或“理学”代替“哲学”；王国维从普遍的立场出发，坚持认为哲学是中国的固有之学，只是用名不同罢了。当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先生用“哲学”这一术语分别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大纲》的时候，他们都认真思考了运用“哲学”概念的正当性问题，并从此出发建立起了为时代刻上了印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按照张岱年先生的处理方式，“哲学”术语源于西方但“哲学”不等于“西方哲学”，因为他把“哲学”视为一个“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都是它的一个“属”。即使在西方，“哲学”概念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概念，就像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一样。如果不从类的观点考虑问题，即使在西方也照样会发生使用“哲学”概念的困境。因为“哲学”术语起源于希腊，如果只能把它与希腊相联系而有所谓“希腊哲学”，那么中世纪之后的“西方哲学”都不能称做“哲学”。“哲学”概念在中国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不能说我们所说的“哲学”就“等于”西方所说的“哲学”。因此，问

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不使用“哲学”一词，而在于如何在使用中不断地为“哲学”赋予新的意义，而在于如何从中国哲学中发现哲学的丰富意义。同样，“中国哲学”也不是固定的产物，它会随着我们不断的理解特别是那种突破性理解而得到“转化”和“转生”。

我们确实需要正视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理解和认识中国学问所带来的许多负面性，且不说在教条化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之下那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但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能通过对术语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严格来说，这些术语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内在部分。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反讽局面，即大量使用着翻译过来的源于西方“术语”的人，却同时又一味地主张放弃这些术语。这样，在他们的这种态度之中，就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要求放弃这些“术语”还是要求放弃他们的立场。我们毫不保留地赞成检讨和反思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并为不能在此做出有意义的工作而忧虑。一种积极的办法是，我们在“谨慎地”并通过艰苦努力以“有效地”运用外来范式的同时，也要努力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出我们所需要的范式来。不从事这种积极性的工作，而只是从表面上做文章，说到底不过是自欺欺人。必须承认，在一种情绪式民族主义和廉价式保守主义之下，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困境，同时也就落入到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陷阱。用这种立场研究中国哲学，我不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鼓舞人心的东西。

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的确需要改变，明智的选择是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变；中国哲学史确实需要重写，谨慎的态度是要真正找到能够带来突破的重写途径。从不少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积累，但这种积累还是远远不够的。客观上越来越要求我们摸索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式并获得突破。公正的历史原则将一如既往地按照它的方式选择我们或者是抛弃我们。

带着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和范式更新的渴望，抱着激发问题意识和主题重建及新领域开拓的期待，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长王关林、总编辑张存威、副总编辑郭孟良和编辑卢海山等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宽泛意义上的“前沿”要求我们的研究能够体现出至少一个方面的特点：或者是新问题、新领域；或者是新范式、新方法；或者是新文献、新证据；或者是新探讨、新观点。即便这样，我们也仍然不敢说列入丛书的著作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承诺，请宽容的读者在一个相对意义上理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我们所说的“前沿”。

王中江

2002年10月24日

序 一

嵇康（223~262），魏晋“竹林七贤”之一，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少数能集文学、思想、艺术于一身的天才型人物。他风姿远迈、性情率真、旷达不羁、倜傥潇洒；博览群籍，特好《老子》、《庄子》。不仅能诗擅文，辩才无碍，尤精哲理，著述等身；而且晓通书法、绘画、琴艺、锻铁、狩猎等多项艺能。在短短四十年中，发表过《高士传》、《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春秋左氏传音》及诗、赋、箴、家诫、杂著等数十篇。《世说新语·文学篇》载：“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于此“三理”，嵇康即占有其二，足见他是竹林玄学及江左清谈界之翘楚。

自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倡发“崇本息末论”及“名教出于自然论”后，嵇康即进一步发展为“贵无论”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他的理论实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性烈才高，好发议论，以致得罪当道，被判死刑。当其下狱时，

有太学生数千人为之请命。临刑东市，视死如归，顾日影援琴而弹绝世名曲《广陵散》以终。他完全藐视强权暴政而一任自然的殉道精神与壮美风采，至今犹令人追思不已。

后人要想真切地捕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思想家的灵魂，并深刻地掌握到他玄理哲思中的肯綮，为他在思想史中的地位与影响给予恰当的评价，若非具有专业逻辑析理能力及对中国学术思想具有深度关怀者，实难能为之。然而，吾友曾春海先生却都做到了。这本《嵇康的精神世界》，分别就嵇康的生平事略、时代环境、生命才情、论辩方法、诗文特色，及其自然观、人性观、生死观、养生论、宅卜吉凶说、声无哀乐论、政治社会思想等多种层面，一一论列。不仅资料宏富、举证确凿；行文畅达、条理明晰；对嵇康玄学的诠释与评论也甚精当中肯，颇具卓识。堪称全面性研究嵇康的学术性专著！

曾先生从事儒学与玄学的研究二十余年，所著论文不下数十篇，专书已达六七种。除这本《嵇康的精神世界》专著外，尚有《儒家的哲学》、《王船山易学阐微》、《儒家哲学论集》、《朱熹易学析论》、《陆象山》、《易学哲学的宇宙与人生》等书。其《易学哲学的宇宙与人生》一书，于1999年8月被海峡两岸学界推荐为易学研究中的“龙马奖”得奖作品。而今《嵇康的精神世界》一书又得以再版，此诚中国哲学界值得庆贺的事，故本人乐为之序。曾先生广博思深的学术涵养，努力不懈、时有新书出版的治学精神，实令人敬佩。

林丽真 序于台大中文系研究室

2000年元月

序 二

“竹林七贤”之目始于东晋，自袁宏《名士传》列有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历来学者对于此年代相近竟加以区别，有不同的诠释，本人则主张正始时期的特色为以清谈的形式讨论《易》、《老》，倡“贵无”思想；竹林则肆意酣畅，放浪形骸，以达庄生理境玄趣为主；以冲破礼防、追求自由、回归自我为诉求。而七贤中又以阮籍、嵇康为首，以其思想新颖，著述宏富，且个性任真，形相凸出，故倍享盛誉，俨然成了名士一格的典范。

近年对于“竹林七贤”，尤其嵇、阮的研究已蔚成风气，先有以小说戏剧的文体表现者，继则多以“评传”式，介绍嵇、阮的生平遭际、内心世界及人格形态，进而论及其佳作名篇。然以过分点染其彷徨、求索及寂灭等人生历程，辞采葩流，文艺气息浓厚，对其学说未能进行全面深刻的探讨，反而显得失真或舍本逐末，称不上严谨。至于专论嵇康美学、音乐思想、诗文、养生思想、处世态度、自然思想、认识方法者更层出不穷，间亦有巧构。唯曾教授此作，推陈出新，以

严谨的学术态度，全面照察嵇康之学思，获得了丰硕成果。

此作由方法论入手，总持纲领，可谓直探骊珠，因为方法决定了研究特色与成果，作者于此虽采撷侯外庐之说，却能改弦更张，重视嵇康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论体；其次，探究嵇康的自然论，以作为立说会归的关键。在宏观方面，能从中国哲学史定位魏晋玄学，又由玄学史定位嵇康思想，抓住“元气说”，沿波讨流，脉络可寻。

曾教授每又透过与阮籍的比较呈显嵇康的精义，如其指嵇康的人性论属告子“生之谓性”一系，且强调修一颗虚静灵敏，能持平照物的真心、公心，以去人欲之私，回归人格之完整。在“宝性全真”的修养功夫之下，足以矫外在矩度所带来之拘束与不自然；在回归自然、道心处，使精神全然自主及自由自在，从而焕发其艺术才情，孕育美感，以为其艺文表现臻乎上乘的凭借。当真实生命与天地自然凑泊契应而得浑然忘我之境中，有美善的领域与陶醉，凡此低昂深浅之论，可谓美言络绎，令人无下口处。

还有，作者申说嵇康谈养生，本出于全性宝真，而一旦生命的价值遭到破坏，他能勇于面对死亡，抗拒外力，为选择价值，他显明臧否而无怨无悔，此真能勾勒嵇康之真精神者。

至如于论理前，能先穷本溯源，在其论嵇康之《声无哀乐》时，则溯源儒、道之乐论，以作为嵇康乐论立论之张本，也在剥丝抽茧的检别中，确立了其思想之性质与历史定位，此照本之论实可去肤脉之弊。

本书又能详人之所略，如其追踪仙道思想而顾及卜宅吉凶；述当时政治社会现象，为嵇康反名教、批判政治找到稳实的据点等，皆有可采。虽偶有历史背景、时代环境的掌握稍显疏略处，然瑕不掩瑜，允推为阐发嵇康之宏篇，尤其在论人性论、生死论处，时有超拔慧见，为能入其中、又出其外，而道尽底蕴者。本人涉猎“竹林七贤”之资料甚丰，得读此作，深受启发，故乐于一述读后之心得。

江建俊 于成功大学中文系

序 三

读魏晋之书者谁不知嵇康，亦孰不仰其卓尔不群之风神。然亦多止于临书咏叹，掩卷怆然而已。唯府城曾春海教授在慕其高风雅逸，崇其正直刚烈之余，遂撰为专文，发其底蕴，可谓嵇康千载之知音，古今之诤友。

论者或视嵇康乃性格激烈、脾气暴躁之文人，此非真知叔夜之言。殊不知其暴躁激烈之表象，乃隐忍其不肯苟合于世，用以鄙夷群小、力抗俗流之心，观其《绝交书》之坚持，锻不受值之淑世风度，其用心也深矣。或每以为其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仁义为臭腐”，辄必害时乱教、悖弃礼法，又岂足知嵇康入晋不仕之孤诣苦心哉？反而是一面打着维护名教之大纛，一面肆行其篡夺之实及虚情矫饰构陷异己以遂其荣利私心之辈，才是致使风教凌迟之罪人，无怪乎名教在魏晋会趋于衰微，无论任何世代，苟无真挚热切之生命智能，以践履之充实之，徒具形式之空华外道又何益乎风俗世教？

《庄子·胠篋》中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便已严厉地

批判了假借名教名义以遂行大盗之实者，展现哲人睿智之洞见以及对名教真实价值的关怀。而嵇康可谓再现了庄子批判的精神，其以狷介刚毅之气，执拗之性格斥俗流，表面上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实是以人格护卫了名教，义不负心¹，体现了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志节。如果说王弼、郭象是以思辨方式建构了玄理哲学，用以会通儒道思想，嵇康则是以生命体现了儒道为一的真实内涵，虽然其逝也不免悲壮凄美，诚可歌可泣，真是为魏晋的名士精神树立了典范高标。曾教授此书对于嵇康生命的意涵可谓烛照无遗，至于对嵇康辨名析理的论理逻辑条举并剖析入微，读者自能有得于心，不待赘言。

春海教授谊属学界前辈，然谦冲虚怀，不耻下交，嘱余为文，愧不敢当，谨以读此大作后一愚之得，奉缀数言，用覆哲命，并就教于大方之家。

庄耀郎 识于台湾师大国文学系

自序

由台湾哲学界对中国哲学所出版的著作分布观之，似较偏重于先秦哲学与宋明理学。对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清代乾嘉与当代新儒家哲学的研究虽亦有之，惜著述零散，有遗珠之憾。笔者致力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教学与著述，近年分别在政大哲学系与辅大哲学系开设魏晋哲学，期能与同学们共同探索这一哲学界着力不多，却值得尝试的领域。

就魏晋玄学的前二期而言，正始玄学以王弼最为璀璨，台湾学界着力亦深。继起的竹林玄学，文史界的研究较多，哲学界亦有单篇专论，然而，对某一玄学家作较全面的探讨者似乎不够。在“竹林七贤”中，阮籍与嵇康较受人瞩目。然而两人成就的差异却有着性质上的不同。牟宗三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一书中谓：“阮籍有一浪漫之文人的生命，复有一古典之礼乐生命。……阮籍比较显情，而嵇康则比较显智。故一属文人型，一属哲人型。因较显智，故多方论，往复思辨。故本传称其‘善谈理’。”何启民先生所著的《竹

林七贤研究》亦持相近的观点：“阮籍，有《通易》、《通老》、《达庄》三论……不过裁削字句，骋辞润意，求其文之可诵，其说之可通，虽亦谋于儒道间寻其异同，初未能贯穿三书，而有所发明也。而嵇康则颇有异，其《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或创义以立说，或难问以抒见，混融儒道，组织论体……玄论实至康而完整严谨，格局可观。”嵇康辨名析理的抽象思维能力，反复辩难的曲折论辩方法是竹林玄学的典范，也是魏晋玄学中较具特色者。他所论究的诸玄学论题，例如“声无哀乐论”、“养生论”、“明胆论”、“越名任心说”以及他的生命才情、生死观、政治、社会思想、自然观及其文学造诣等皆是本书所关注的范围。笔者选嵇康作为专著的另一原因，系鉴于“竹林七贤”所蔚成的竹林玄学旨在取竹的形象所转化成具有深意的意象。竹的挺直表征了名士们所崇尚的正直，竹的中空表征着冲虚的心量，竹的节度则表征了君子的节操有度，翠绿表征了名士由生活的雅兴所焕发出来无比清爽的雅趣与活力。前三者的正直、冲虚、节操意谓着君子的高风亮节，后者的雅趣意谓着越名任心的性情真人，在适性逍遥中实现了悠然自得的生命情韵。笔者认为，“竹林七贤”中唯独嵇康充分地符应了由竹的形象所表征之四种含义的意象。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谓“惟嵇志清峻”诚深获我心。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铨（今安徽宿县）人。他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竹林大名士，玄学与美学的杰出学者，亦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处在魏晋时局剧变、政治极度不安定及不宽容的黑暗时期。他深邃、丰富而多彩的精神生活和贫困且险恶的政治、社会环境之间，呈现着紧张的对比关系。其个人的才性和价值理想与异质冲突的政局，形成两极化的矛盾对立，铸成他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遭时不遇、有志难伸的嵇康，刚肠疾恶，难以隐忍，于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荡着种种不堪的痛苦。他的著作一方面表现了他珍惜生命、崇尚自然之种种美好价值，期待

长寿、享受生命之一切甜美的情趣和温馨。另一方面，他却大胆写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疾恶如仇地讽批了司马昭等人阴谋篡权夺位，却又带着道德的面具自比附于周公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以掩饰其对曹髦、毋丘俭的政治杀害，以及假礼乐的名教之治所遂行的残酷迫害政治异己之恶行。他一方面博学多闻，好读书，另一方面又著《难自然好学论》，露骨地批判汉代设五经博士以来，士人治经学及修礼教已异化成沽名钓誉，求个人荣显的工具性手段，而非真正肯认经学及礼教自身的内在价值。换言之，在利禄的诱惑下，读书人垂涎借经学及礼教之途径所能获致之个人名利，“经明行修”不再是充实自我、提升人生境界的“为己之学”，而沦为向当权者求个人荣显财富的“为人之学”。他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事实上是借言出意，意有所表地写给司马昭集团的绝交书。文中所陈述的“七不可”是影射彼时官僚文化的虚伪不实，“二不可”是自陈无法容忍罪恶满盈的司马氏集团之所作所为，甚觉不齿。他的《与吕长悌绝交书》以无比的道德勇气，无惧于吕长悌已为司马昭身边有权有势的红人，正直地明究是非，捍卫人间的正义及人性的尊严，大义凛然地说出：“都之含忍足下，实由吾言，今都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他所说的“义不负心，保明其事”的肺腑之言，读之可使贪夫廉、怯夫勇，凸显嵇康光明正直、令人敬佩的人格光辉。然而，悲剧终于发生了。嵇康的正直与义行激发了钟会挟宿怨以私仇公报的念头。钟会将嵇康冠上“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害时乱教”的重大罪名。司马昭则需要借诛杀一位有声望的名士来对一些桀骜不臣服的名士们示警发威。嵇康不幸成为清代戴震所谓“以理杀人”的牺牲品，礼教吃人的历史例证。《颜氏家训·养生篇》评曰：“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勉学篇》亦云：“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庆之流也。”诚然，嵇康在《养生论》中虽自许于“无执无为，遗世坐忘，

以宝性全真”之明哲保身，然而在生死大节上岂能贪生怕死而成为辱节苟生之徒？孟子说：“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嵇康在诗文中也自述“肆志养浩然”、“贵在肆志，纵心无悔”。对他而言，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就义的气节，为了顾全公理正义的价值，他不惜以死相许，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勇气是何等的悲切和伟烈！他坚持生而为人基本尊严却不自我膨胀，以谦冲而积极的态度去体证生而为人之本分，善尽基于人性尊严的崇高价值所应尽的人文责任。他临刑东市，犹不改平日神情，顾日影孤独地援琴弹奏出当时只有他的心境、人品及琴艺所能活现的《广陵散》，以慷慨激昂的悲壮与高志之氛围就义。琴声、古琴及如彗星流逝般的嵇康的一次性生命成为千古绝响，也为后人留下千古性的人格生命之典范。

至于他的文艺成就，他在诗文中坦露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人与大自然交融之真意，享受沉醉于其中的自然之趣与自得之乐。可是另一方面，当他遇到不堪忍受的人间不义之丑恶事，他却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无条件地表现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丈夫风骨及浩然正气，他说“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潇洒地超脱人为的“名教”束缚，在《声无哀乐论》一文中，露骨地批判音乐的体性在其客观独立地体现大自然无比之和谐美。他在《琴赋》一文中，用美妙的音乐审美性来描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共鸣之感。可是，他在文中也折射出音乐不该沦为政治教化目的下的工具价值、附庸地位，为音乐美学开辟出自身该有的领域和独立地位。在文学成就上，他的诗文从本质上承接了“建安风骨”，刘勰的评论指出“嵇康师心以遣论”，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谓“师心”是魏末晋初的文学特色，且意有所指地说：“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嵇康的四言诗突破《诗经》中四言的藩篱，诗如其人地刚健正直，又清峻秀逸，志趣高雅。然而，他的诗缺少含蓄及具象性，是美中不足处。他在哲学论文上颇有成就，他七问七答的